

文学遗产　2014 年第 1 期（2014 年 1 月 15 日）
主管：中国社会科学院
主办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编辑：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
出版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电话：（010）85195453
地址：100732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
印刷：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第一期

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　举报电话：010－63094651

http：//www.literature.net.cn
E－mail：wxyc－wx@cass.org.cn
统一刊号：CN 11－1009/I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：ISSN 0257－5914
国内发行：北京报刊发行局
邮发代号：80－438
国外发行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（北京 399 信箱）
国外代号：BM 628

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考论

漆永祥

内容提要 清乾嘉时期，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，以及他们围绕汉、宋之学与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等展开的争鸣，是学术界讨论较多的议题。笔者认为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间的交往，如方苞与江永论礼不合，戴震拒纳姚鼐为弟子，江藩与方东树之间有激烈争论等，多影响皮附之说，皆非史实；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间，也从未产生过旗鼓相当的正面交锋；终姚鼐辞世前后，考据学一家独大的局面并未改观，桐城派学人对考据学不构成威胁；后人所论当时桐城派与考据学家间的争鸣，只是一场"关公战秦琼"式的构建与想象；桐城派产生较大影响，是晚清曾国藩等人以后的事情；乾嘉时期的确存在着时隐时显的汉、宋之争，但一盘散沙的宋学派也无法撼动铁板一块的汉学派的地位。

关键词 乾嘉时期　考据学　桐城派　汉宋之争

清乾嘉时期，考据学家（汉学家）与桐城派之关系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争鸣①，是学术界讨论与关注较多的议题，其中涉及汉、宋之争，义理、考据与词章之争，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，道统与学统之争等诸多问题，这些问题或重叠、或相错、或交织、或矛盾，再夹杂学者之间的个人恩怨，以及后人的描摹与论说，于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雾霭重重。对真相的考辨并不是越辨越真，而是愈往后世，歧说愈多，也离真相愈远。本文拟分九个问题，就此议题展开考辨与论述，以期还原部分事实真相，纠误补阙，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，供学术界参稽。

一　江永与方苞"论礼交恶"真相考

姚鼐在初创桐城派时，将其清代的源头追溯到了方苞、刘大櫆，即所谓"桐城三祖"中的前两位。世人每论考据学家与桐城学者结怨，始于江永与方苞在京师之论礼学不合，而其依据，则主要是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的记载。江藩记江永尝一游京师：

> 是时，三礼馆总裁方侍郎苞自负其学，见永，即以所疑《士冠礼》、《士昏礼》数事为问，从容答之。苞负气不服，永哂之而已。②

考清廷于乾隆元年（1736）开三礼馆，命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、朱轼、兵部尚书甘汝来为总裁，礼部尚书杨名时、礼部左侍郎徐元梦、内阁学士方苞、王兰生为副总裁。二年，三礼馆檄取江永《礼书纲目》。五年八月江永入都，翌年归里③。方苞问礼之事，即发生在此时。刘大櫆《江永传》曰：

① "考据学"与"汉学"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但一般情况下，清代考据学家与汉学家的身份大部分是重叠的，本文中所论"考据学家"与"汉学家"使用的就是大致趋同的泛概念，特此说明。

② 江藩著、漆永祥笺释《汉学师承记笺释》卷五《江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上册，第492页。

③ 江锦波等《江慎修年谱》，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92册，第52—53页。

> 尝一至京师，朝廷方开《三礼》之馆，卿士预修《三礼》者，就质所疑，先生为置辨，皆畅然意满称善。①

刘大櫆未言质疑者为谁，江永弟子戴震《江慎修先生事略状》曰：

> 先生尝一游京师，以同郡程编修恂延之至也。三礼馆总裁桐城方侍郎苞素负其学，及闻先生，愿得见，见则以所疑《士冠礼》、《士昏礼》中数事为问，先生从容置答，乃大折服。②

又王昶《江慎修先生墓志铭》曰：

> 先生年六十，尝偕友人入都，时开三礼馆，总裁方阁学苞以经术自命，举《冠礼》、《昏礼》数条为难，先生从容详对，方公折服。③

又钱大昕《江先生永传》曰：

> 尝一游京师，同郡程编修恂延主其邸，桐城方侍郎苞素以《三礼》自负，闻先生名，愿一见。见则以所疑《士冠礼》、《士昏礼》中数事为问，先生从容置答，乃大折服。④

诸家之说，大同小异。考方苞《仪礼析疑》，《士冠》、《士昏》二篇中，唯引郑注与敖继公说，或申或驳，极少引及他家之说，也未引江永论礼之语。又笔者曾细核今藏上海图书馆之江永《善余堂文集》抄本，其中有《随笔札记》，即当时与方苞等人往复讨论《三礼》之条目，但其中亦无任何鄙视方氏之文字。

又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在言及沈彤时，谓当时"有人荐修《三礼》及《大清一统志》，议叙得九品官，耻不仕"⑤。考惠栋《沈君果堂墓志铭》称"著《群经小疏》若干卷，凡所发正，咸有义据。侍郎方公苞绝重之"⑥。又沈廷芳撰沈彤墓志铭曰：

> 雍正间至京师，望溪方公见其所疏三经，谓得圣人精奥；读其文又谓气格直似韩子。乾隆初元，辑《三礼义疏》，遂荐入馆，名动辇下。⑦

又据李富孙《鹤征后录》，沈彤"由内阁学士吴家骐荐举"⑧。又吴德旋谓"冠云以诸生应博学鸿词举，至京师，最为方侍郎灵皋所推重，荐修《一统志》"⑨。然则荐举沈彤入京者为吴家骐，而荐人三礼馆者，则实为方苞也。

由上述诸例可知，方苞始终礼敬江永、沈彤等人，且荐其人馆修书。即后来之姚鼐，在述及江永时，仍是一片赞扬之语。其曰：

> 婺源自宋笃生朱子，传至元明，儒者继起，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矣，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为浮诞，讲论经义，精核贯通，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者焉。近世若江慎修永，其尤也。⑩

① 刘大櫆《海峰文集》卷六《江永传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86册，第170页。

② 戴震著、赵玉新点校《戴震文集》卷一二《江慎修先生事略状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81页。

③ 王昶《春融堂文集》卷五五《江慎修先生墓志铭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438册，第217页。

④ 钱大昕著、吕友仁校点《潜研堂集》卷三九《江先生永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2册，第705—706页。

⑤ 《汉学师承记笺释》卷二《沈彤》，上册，第215页。

⑥ 惠栋著、漆永祥点校《东吴三惠诗文集·松崖文钞》卷二《沈君果堂墓志铭》，台湾"中央研究院"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，第344—345页。

⑦ 钱仪吉著、靳斯标点《碑传集》卷一三三《征士文孝沈先生墓志铭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，第11册，第3980页。

⑧ 李富孙《鹤征后录》卷九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辑第23册，第738页。

⑨ 吴德旋《初月楼续闻见录》卷一，《丛书集成三编》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，第76册，第542页。

⑩ 姚鼐《惜抱轩全集·文后集》卷五《吴石湖家传》，中国书店1991年版，第240页。

此可知终乾隆朝，论江永、沈彤等人与方苞之关系，诸家记载皆无异辞。唯独嘉庆时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中多诬方氏，故或讳而不举其名，或直接将钱大昕等文中“乃大折服”改为“苞负气不服，永哂之而已”。然则于方苞学问人品，俱有所诬。后人所谓桐城学者与考据学家交恶始于江永、方苞之论礼，乃江藩篡改史料之结果，远非事实可知。至于后来刘声木又称沈彤“师事方苞”①，此则为壮大桐城派之势力，以沈氏为方苞弟子，较之江藩，亦所谓过犹不及焉。

二　姚鼐“拜师事件”新解

1. 姚鼐“拜师事件”始末

江永与方苞在京师研讨礼学，气氛融洽，并无交恶之事。后人又谓至乾隆朝，姚鼐欲入戴震门下，震严拒不纳，故一俟戴氏卒，姚氏即严斥戴学，以为报复。如章炳麟曰：

震始入四库馆，诸儒皆震竦之，愿敛衽为弟子。天下视文士渐轻。文士与经儒始交恶。而江淮间治文辞者，故有方苞、姚范、刘大櫆，皆产桐城，以效法曾巩、归有光相高，亦愿尸程、朱为后世，谓之桐城义法。震为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以明材性，学者自是薄程、朱。桐城诸家，本未得程、朱要领，徒援引肤末，大言自壮，故尤被轻蔑。范从子姚鼐，欲从震学；震谢之，犹亟以微言匡饬。鼐不平，数持论诋朴学残破。其后方东树为《汉学商兑》，徽章益分。阳湖恽敬、陆继辂，亦阴自桐城受义法。其余为俪辞者众，或阳奉戴氏，实不与其学相容。②

案章氏此说，亦模棱两可之论，与事实大有出入。考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王鸣盛、钱大昕、纪昀等高中进士；姚鼐亦同时入都应试，惜未第。也恰在是年，戴震避仇入京，困于逆旅，时往钱大昕寓所，二人论学竟日，钱氏叹为“天下奇才”，推荐戴氏参与编纂秦蕙田主持的《五礼通考》，并把他介绍给卢文弨、朱筠、王鸣盛、王昶等人，戴氏名噪一时，自此“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”③。

翌年乙亥秋间，戴震与姚鼐相识④，姚氏提出拜戴氏为师，并就戴氏《考工记图》一书提出具体意见。据戴震《考工记图后序》末题“时柔兆摄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间”⑤，则知《考工记图》草成于丙寅（乾隆十一年，1746），然藏之箧中，并未刊行。纪昀亦于乾隆二十年初识戴氏，见其《考工记图》图后附以己说而无注，纪氏“奇其书，欲付之梓”⑥。以是之故，戴震向姚鼐言欲改定《考工记图》，姚氏致书戴氏，“意主不必汲汲成书”，戴氏闻听此言，“若雷霆惊耳”，遂复信谢之。姚氏信中称欲拜戴氏为师，戴氏曰：

至欲以仆为师，则别有说：非徒自顾不足为师；亦非谓所学如足下，断然以不敏谢也。古之所谓友，固分师之半。仆与足下，无妨交相师，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，苟有过则相规，使道在人不在言，斯不失友之谓，固大善。昨辱简，自谦太过，称夫子，非所敢当之，谨奉缴。承示文论延陵季子处识数语，并《考工记图》呈上，乞教正也！⑦

戴氏婉谢姚鼐入其门下，此即姚鼐拜师被拒事件之经过。姚鼐信中如何“自谦太过”，因此信不载于姚氏《惜抱轩文集》，故不可知。然通观戴氏回札，则谦和有礼，并无任何辱谩轻蔑之词。戴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姚鼐不必急于成书的建议，《考工记图》复经一年多的补注，终成定稿，由纪昀

① 刘声木《桐城文学渊源考》卷二《沈彤》，《丛书集成三编》第6册，第730页。
② 章炳麟著、徐复注《訄书详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51页。
③ 《潜研堂集》卷三九《戴先生震传》，第2册，第711页。
④ 详参王达敏《姚鼐与乾嘉学派》，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4—15页。
⑤ 戴震《戴震全书·考工记图后序》，黄山书社1994年版，第5册，第462页。
⑥ 纪昀著、孙致中等校点《纪晓岚文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册，第157页。
⑦ 《戴震文集》卷九《与姚孝廉姬传书》，第142页。

刊行①。姚鼐在事后多年，还曾提到此事。其曰：

休宁戴东原作《考工记图》，余读之，推考古制，信多当，然意谓有未尽者。……余往时与东原同居四五月，东原时始属稿此书，余不及与尽论也，今疑义蓄余中，不及见东原而正之矣，是可惜也。②

戴、姚“同居四五月”正是这一时期，可知“拜师事件”并未影响二人正常往来。例如戴震考《尚书·尧典》“光被四表”，以为“光”当作“横”，然苦无证佐，后得钱大昕、姚鼐分别为其列举《后汉书·冯异传》与班固《西都赋》为证。戴震校《水经注》成，“入都即以示纪文达、钱晓征、姚姬传及玉裁，不过四五人。钱、姚皆录于读本”③。据此可知，戴震虽未纳姚鼐为入室弟子，但仍非常引重，视为不可多得之数数学友之一。王达敏兄谓“拜师见拒对姚、戴关系并未产生严重后果”，“如果把多年后姚、戴或桐城派、汉学派之间的冲突追根到此，则未免言重”④。其言良是矣。

2. 戴震拒绝姚鼐原因新解

姚鼐因何要拜戴震为师？就当时情势而论，戴震在京师声誉日隆，而姚鼐为刚刚落第的举子，更无成熟的学术定见，在与戴氏接触并闻其“高论”后，寄予很高的期望，即其诗所谓“群士盛衰占硕果，六经明晦望萌芽”⑤者。笔者认为，对姚鼐拜师的动机，也不可有太多的推测，视为一位求学青年向一位经学之师求教，足矣。

戴震拒绝姚鼐拜师事件，后来更被无限放大，至喻为考据学家与桐城诸家在乾隆朝交恶之标志。至于拒绝的原因，也多以为戴氏主考据，反宋学；姚鼐主宋学，批考据。故二人学术宗尚不同，方法门径相异，且姚氏于戴学持有保留态度。戴既不纳姚入室，姚以之为受辱，故戴氏卒后，即转而攻戴，考据学派与桐城派之关系终成水火⑥。

这些说法貌似有理，但问题是：古人欲拜某人为师，必是虔心诚意地敬仰其人其学，才甘愿入室为弟子；而姚鼐既然对戴学持有保留态度，又无人逼迫，那因何别别扭扭非要拜其为师呢？莫非是为了“人其室，操其戈而伐其人”？抑或竟是为自取其辱么？

实际上，如果将戴震拒绝姚鼐事件放在清代学术的大背景下来看，就会明白这既非戴氏之故为客套与谦虚，也非学术宗尚的原因。清代考据学家认为，明朝中后期学术界广收门徒，讲学结社，理学玄谈，空言误国。因此，清初顾炎武即不喜为师，以为“士而不先言耻，则为无本之人；非好古而多闻，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，而讲空虚之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”⑦。所以，对于“效嚢者二三先生招门徒，立名誉，以光显于世，则私心有所不愿也”⑧，以是之故，顾氏“不坐讲堂，不收门徒”⑨，且行之终身。

乾嘉考据学家深受顾炎武影响，亦不喜讲学结社，广纳门徒。与戴震同时之钱大昕，当有人欲拜

① 据纪昀称，戴氏经两个半年的修订，最后成定稿。但考虑到戴氏书初稿成于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，在二十年欲谋付梓后，又经一年余的修改，则其慎重之意可知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算是接受了姚鼐的建议，戴氏复姚鼐札，自谓“重违知己之意，遂欲删取成书”者，乃谦词也。
② 《惜抱轩全集·文集》卷五《书考工记图后》，第57—58页。
③ 段玉裁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，载《戴震文集》，第234页。
④ 《姚鼐与乾嘉学派》，第21页。
⑤ 《惜抱轩全集·诗集》卷六《赠戴东原》，第400页。
⑥ 详参《姚鼐与乾嘉学派》中引用诸家之说及相关论述，第21—30页。
⑦ 顾炎武著、华忱之点校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文集》卷三《与友人论学书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41页。
⑧ 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文集》卷三《与友人论门人书》，第47页。
⑨ 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余集》，第168页。

其为师时，他也认为“古之好为师也以名，今之好为师也以利”，二者皆非己愿为，又称：“如以仆粗通经史，可备刍荛之询，他日以平交往还足矣。直、谅、多闻，谓之三益，不识仆之戆直，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?”① 此语与戴震婉拒姚鼐所言，话语完全相同。

戴震不喜为师，从段玉裁拜师一事也可以看出。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，段氏向戴氏呈札问安，并求请业。戴震再三辞之，并谓“在吾兄实出于好学之盛心，弟亦非谦退不敢也。古人所谓友，原有相师之义，我辈但还古之友道可耳”。段氏还特意拈出姚鼐拜师一事，引为例证，说“观于姬传及玉裁之事，可以见先生之用心矣”②。至三十四年，段氏再三提出拜师之请，戴氏才勉从之。

乾嘉考据学家极其重视师承，这成为他们治学的鲜明特征之一，这似乎与反对好为人师自相矛盾。但他们所谓师承，一方面是继承汉儒重小学训诂、学有本源的特点，另一方面则是在经学研究中注重专门之学。如汉《易》因郑玄、荀爽、虞翻诸家，各不相同，必有所专主，才能深研其学，即皮锡瑞所谓“传家法则有本源，守颛门则无淆杂”③。这与别立门户、拥徒自重、讲学玄谈的师弟关系，是有本质区别的。因此，乾嘉考据学家中，除了朱筠椒花吟舫聚徒高会，门庭若市外，很少有人像袁枚那样有意识地竖旗结派，广纳弟子。惠栋、江永、戴震诸人，亲传弟子唯数人而已；即钱大昕、卢文弨、段玉裁等人，后半生多在书院课徒，但其师生关系与宋明理学家前呼后拥、聚众设坛的格局完全不同。江藩曾对其师王昶不加拣择而滥收弟子当面谏止，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④。

因此，从顾炎武至戴震、钱大昕诸人，皆一脉相通，不喜为讲学之师。戴氏之拒纳姚鼐入门墙，放在此背景下考察，则人情合理，戴氏不以是为非，姚氏亦不以是为恨。上述段玉裁举戴震屡拒自己为弟子时，很自然地引证到姚鼐的例子，也只是为说明其师不愿收徒，并无任何引为荣光或贬低姚氏之意。在当时学界，也从未有人对戴、姚关系提出过异议，王达敏兄认为：“在时人眼里，姚、戴及其分属的宋、汉营垒的不和，根源于二者思想和治学祈向的对立，而与个人之间的恩怨无甚关联。”⑤ 笔者甚至认为，在时人眼里，姚、戴拜师事件及其关系根本就不是一件什么大事，既不关涉个人恩怨，更不关乎宋、汉营垒，表面也未失和。故谓姚鼐“遭到戴逊辞坚拒，在学林大失面子，终身切齿，所撰《惜抱轩尺牍》等多收痛诋戴震和考据学的文字”⑥ 显系夸大不实之辞。

三　戴震对姚鼐之影响与姚鼐之攻驳戴震

1. 戴震对姚鼐的影响——挥之不去的“影子”

如上所述，戴震、姚鼐之间发生的“拜师事件”，至少表面看起来是风平浪静，无任何交恶的迹象。但戴氏对姚氏产生过什么影响，“拜师事件”在姚鼐心中留下了什么阴影，则是另外的问题。笔者认为，在姚鼐一生中，戴震的确是挥之不去的“影子”，使姚氏终身皆背负压力。戴氏对姚氏产生的影响或者说刺激，主要在如下几方面：

其一，姚鼐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分学术之说，直接来自戴震的影响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戴震即提出：“古今学问之途，其大致有三：或事于理义；或事于制数；或事于文章。”⑦ 余英时认为，“在

① 《潜研堂集》卷三三《与友人论师书》，第2册，第595页。

② 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，第227页。

③ 皮锡瑞著、周予同注《经学历史》十《经学复盛时代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21页。

④ 详参《汉学师承记笺释》卷四《王兰泉先生》，上册，第377页。

⑤ 《姚鼐与乾嘉学派》，第21页。

⑥ 朱维铮《汉学与反汉学——江藩的〈汉学师承记〉、〈宋学渊源记〉和方东树的〈汉学商兑〉》，载朱维铮《求索真文明——晚清学术史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4页。

⑦ 《戴震文集》卷九《与方希原书》，第143页。

乾隆时代，正式提出义理、考证、词章之三分法，东原似为最早，其后姚姬传与章实斋皆各有发挥”；究其实，乾嘉学者围绕义理、考据与词章，在宋以来诸家说的基础上，如王鸣盛、钱大昕、卢文弨、段玉裁、顾广圻、孙星衍、焦循、阮元等，都有各自的看法①。就戴震与姚鼐而论，戴氏认为义理必须经考证才能明晰，即其所谓“故训明则古经明，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，而我心之所同然者，乃因之而明。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，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”②。至于“事于文章者，等而末者也”③。而姚鼐则认为，义理不必非经过考证才能明晰，且三者“苟善用之，则皆足以相济，苟不善用之，则或至于相害”④。至于文章，乃姚氏一生之追求，他曾借姚椿之语夸赞自己，谓“以宋元以来学问、文章之统相属”⑤。其弟子更喻之以当代韩愈、欧阳修，推褒不遗余力。

其二，在考据学南北呼应、日盛一日的大背景下，姚鼐倍感压力，如芒刺背。学术界以为：“在汉学大潮涌动于京师之时，姚鼐起意拜汉学权威戴震为师，此事的确可视为其学术生涯的分水岭。此前，姚鼐的学术兴趣在辞章；此后，其学问重心逐步转向了汉学考据。”⑥ 窃以为姚鼐的兴趣，重点在辞章，并未有前后如此大的改变，只是在当时戴氏及考据学氛围之中不甘示弱，无论是从“预流”的角度，还是从争胜角力的考量出发，姚氏也不能免俗地从事一些考据，如著《九经说》诸书，以示自己的考证功夫不弱于考证诸家。但这点事实证明并不成功，我们稍后再论。

其三，在考据学派强大的压力之下，姚鼐产生了树旗立帜、建立桐城文统的强烈意识。姚鼐在四库馆中，面对汉学炽盛的局面，孤寂难耐，终至辞职南归，但此时开宗立派的意识已经萌动。“如果深人考察就会发现，姚鼐在宋学旗帜下建立桐城文统，欲在学坛别立一军，包涵着与汉学派相抗的深刻动机。”⑦ 毫无疑问，正是考据学鼎盛的氛围，使姚鼐创立山头分庭抗礼的决心更为坚定。

2. 姚鼐对戴震的攻击——从商略学术到辱及人身

从戴震、姚鼐相识至戴震辞世，在双方的学术往来中，姚氏对戴氏的批驳均在学术争鸣的正常范围内。但姚鼐非常明白，在汉学炽盛的局面下，要建立桐城文统并产生影响，则必须先要“有立”，即描摹出桐城学统的师承源流与规模统系；同时要“有破”，即必须要有批判与打击的主要对象。正如惠栋在打出“汉学”旗号时，对“宋学”与宋儒进行了火力极猛的攻击，姚鼐在选择攻击点时，便将重点放在了困扰他的“影子”戴震身上。当时影响最大的考据学大师，主要为惠栋、戴震、钱大昕三人。姚鼐虽未见过惠氏，但批评其《左传补注》“所举太碎小”⑧；姚氏也与钱氏在有关秦郡的考辨方面意见不一，并斥其反复论争，“于身心家国初无关涉，哓哓致辨，夫亦何为”⑨。但惠氏早逝，钱氏并无专著攻驳理学，唯戴震《孟子字义疏证》诸书，“欲言义理，以夺闽洛之席”⑩。这也是最让“学行继程朱之后，文章在韩欧之间”并且隐然以道统正脉自许、以程朱为“父师”的姚鼐所切齿的，因此无论于公于私，戴震都是最合适的攻击对象。同时，姚鼐曾说“国朝经学之盛在新安，古文之盛

① 余英时《论戴震与章学诚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》，三联书店2000年版，第128页。其实当时学者持此说者甚众，称谓各各不一，然大要皆围绕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者而展开讨论，详参拙著《乾嘉考据学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10—229页。

② 《戴震文集》卷一一《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》，第168页。

③ 《戴震文集》卷九《与方希原书》，第143页。

④ 《惜抱轩全集·文集》卷四《述庵文钞序》，第46页。

⑤ 《惜抱轩全集·文后集》卷三《复姚春木书》，第224页。

⑥ 《姚鼐与乾嘉学派》，第21页。

⑦ 《姚鼐与乾嘉学派》，第107页。

⑧ 姚鼐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（其四）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铅印本，下册，第6b页。

⑨ 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四《与刘东明》，上册，第12b页。

⑩ 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《与陈硕士（其三十一）》，下册，第13b页。

在桐城"①。新安学术的代表人物为江永、戴震，江氏是朱筠在任安徽学政时加以表彰后才为世所重，并附弟子戴震之名才有了持续的影响力。因此，如果要在维护程朱理学的旗号下建立桐城文派，则打倒新安经学这一"拦路虎"，势在必行。姚氏弟子方东树在《汉学商兑》中谈到毛奇龄与惠栋时曾曰：

（毛奇龄）指名而攻驳者，惟顾炎武、阎若璩、胡渭三人，以三人皆博学重望，足以攻击，而余子则不足齿录也。又惠定宇教江声曰："罗愿非有宋大儒，不必辨。"按若是必择大儒而攻之，然后乃足立名，此近日学者著书攻朱子之本谋也。②

毛奇龄、惠栋本意所指如何，我们在此不论，但"择大儒而攻之"，却正是方东树最擅长的方法，也是桐城学人最喜用之法，姚鼐之大肆攻讦戴震，亦当如是看。而最引起后来争议的，就是他对毛奇龄、李塨、程廷祚、戴震等人的抨击："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，安得不为天之所恶，故毛大可、李刚主、程绵庄、戴东原，率皆身灭嗣绝，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。"③ 此种攻驳之词，大失学人态度，已经超出学术争鸣的范围了。

四　姚鼐"桐城派"之创立与在当时的影响

一般认为，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，姚鼐撰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，是他对桐城文统最早的勾勒与描绘。其曰：

曩者，鼐在京师，歙程吏部、历城周编修语曰：为文章者，有所法而后能，有所变而后大，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，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，昔有方侍郎，今有刘先生。天下文章，其出于桐城乎！④

尽管是借程晋芳、周永年之口，但"天下文章出于桐城"之说终于出炉。四十四年，姚氏编《古文辞类纂》成，为其树立桐城派的标志性纂述。后吴敏树论曰：

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，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，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，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《古文辞类纂》一书，直以归、方续八家，刘氏嗣之，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。⑤

乾隆四十五年，姚氏主讲安庆敬敷书院。五十三年，主歙县紫阳书院。五十四年，主江宁钟山书院，自后主钟山前后二十年。五十七年，陈用光刊姚氏《春秋说》、《春秋三传补注》。嘉庆元年（1796），姚氏有《复秦小岘书》倡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分说。二年，《九经说》刊行。四年，刻《诗集》五卷。五年，江宁诸生为刻《文集》十六卷。自主讲钟山起，姚鼐才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课徒之地，其后慕名来学者日多，后人评曰：

门弟子知名甚众，其尤著者，上元管同、梅曾亮，同邑方东树、刘开，而歙县鲍桂星、新城陈用光、江宁邓廷桢，最为显达。至私淑称弟子者，则宜兴吴德旋、宝山毛岳生、华亭姚椿、同邑张聪咸，皆以文学著述称名。⑥

姚鼐弟子方东树夸赞其师，谓"乾嘉中，海内学者以广博宏通相矜放，而言古文独推桐城姚氏，自中朝搢绅及于乡曲后进无异辞"⑦。刘开曾在论其师扭转风气的作用时说：

---

① 吴定《紫石泉山房文集》卷一〇《翰林院修撰金先生墓志铭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408册，第383页。
② 方东树《书林扬觯》卷下《著书争辨》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9辑第15册，第29页。
③ 《惜抱轩全集·文集》卷六《再复简斋书》，第78页。
④ 《惜抱轩全集·文集》卷七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，第87页。
⑤ 吴敏树《柈湖文集》卷六《与筱岑论文派书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20册，第360页。
⑥ 郑福照《姚惜抱先生年谱》，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第107册，第624—625页。
⑦ 方东树《考槃集文录》卷一〇《管异之墓志铭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07册，第288页。

天下风气之变，其势及于数十百年，而其始则起于一人之定向。方其习之未变，举世安于固陋而不知振，有明道者为之抉其蒙而发其瞶，而大义之微者以昭；及其弊之既成，举世习知为非而不能正，有明道者为之挽其颓而矫其失，而流俗之靡者以兴。故夫人才之盛衰，学术之明晦，悉视其人之一身。而其身之存，天且默相之，以系世运。①

但平心而论，此类对姚鼐的歌颂及夸赞，都来自桐城姚门弟子，有点自卖自夸的味道。实际无论从姚鼐著述的传播及其古文影响而论，终乾隆一朝都未产生过大的动静，即嘉道时期，也未产生流布南北的轰动效应。但与汉学家不擅时文，阻于科举功名不同，姚门弟子中，则有一批金榜高中并身居要职者，如陈用光、姚莹、邓廷桢、鲍桂星、姚元之、康绍镛、李宗传、周兴岱等，皆至显宦，权倾一时。他们利用自己在官场与科场的话语权，对姚鼐古文及其学说的传播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但汉学一统的学术格局并未彻底改变。桐城派影响的扩大与传播的深远，还要等到曾国藩等人势力起来之后，以"下规姚曾，上师韩欧"的宗旨进行再传播，影响才及大江南北；而下一波影响则要到马叙伦、姚永概等人入主新式大学，与林纾等人相应和，与"桐城谬种"的骂声一起在学林传播并逐渐淡出。

五　姚鼐的落寞抗争与考据学家之无视其学

1.《赠钱献之序》——姚鼐向考据学家挑战的宣言书

姚鼐生前，无论其学术与古文观念如何变化，他坚举宋学，维护程朱，在这点上是始终一贯的。四库馆开，汉学浸盛，姚鼐曾回忆其在都下与戴震等辩论时，批评考据诸家曰：

宗汉学为至，以攻驳程朱为能，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，而相率而效者，因大为学术之害。……博闻强识，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，以将跨越宋君子，则不可也。鼐往昔在都中，与戴东原辈往复尝论此事，作《送钱献之序》，发明此旨，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，而义不可以默焉耳。②

前人对《赠钱献之序》所论甚少，但此文在姚氏思想发展脉络中起着分水岭的作用，可以看做是当时"力小而孤"的姚鼐，在四库馆离职前向考据学派发出的抗议书与宣战书。

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，钱坫出都，归江南而适岭表。也在此年，姚鼐乞病解官，绝意离开京城。《赠钱献之序》实际是一篇经学史论文，姚鼐以为自汉至唐，经学蒙蔽，未得真解。"宋之时，真儒乃得圣人之旨，群经略有定说。元明守之，著为功令。"姚氏接着说：

明末至今日，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，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，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，以博为量，以窥隙攻难为功。其甚者，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，枝之猎而去其根，细之搜而遗其巨，夫宁非蔽与！③

姚鼐通过对经学史的梳理，来否定汉唐经学，褒扬宋儒尤其是朱熹的功绩，并对当代考据学提出严正批驳。清季学者张星鉴曾论曰：

桐城姚姬传，不好汉学，以宋学传授生徒，其《赠钱献之序》痛斥汉儒之谬，为生平论学大端，其见非不卓然矣。然姬传尝师事戴先生东原，迨其殁也，姬传致书友人云东原毁谤朱子，是以乏嗣，其斥东原不遗余力，是岂姬传之学识先后矛盾欤？抑别有憾于东原欤？未可知也。④

---

① 刘开《孟涂文集》卷六《姬传先生八十寿序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43册，第540页。
② 《惜抱轩全集·文集》卷六《复蒋松如书》，第73页。
③ 《惜抱轩全集·文集》卷七《赠钱献之序》，第84—85页。
④ 张星鉴《仰箫楼文集·赠何愿船序》，清光绪刻本，第14a—15a页。

张氏谓《赠钱献之序》为姚氏“生平论学大端”，可谓慧眼别识，乃姚鼐之解人。钱坫为钱大昕之侄，姚氏借其南归赠文，以阐明其宗程朱而贬汉学的观点，不仅是给钱坫看的，而且是在京师四库馆与戴震等人争论的同时，向在南方主持风会的钱大昕等人的一种宣示与挑战。不久，姚氏亦辞官出都，与汉学家公然异途；同时培植后进，沉潜蓄力，开始将建立桐城文统的想法付诸具体行动。

2. 姚鼐生前落寞与考据学家无视其学

如上所述，尽管姚鼐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向汉学家公开挑战，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甚至至其故去，却是应者寥寥，汉学家几乎视如不见。有以下数事可证：

其一，姚鼐在四库馆时，力图与戴震辈相抗衡，但争执的结果是“力小而孤”，只好辞官归里，以谋另立山头。其二，姚鼐处心积虑所撰《赠钱献之序》，不但没起到“吹皱一池春水”的作用，甚至没有泛起一丝的涟漪。其三，姚鼐为王昶所撰《述庵文钞序》，再次强调他的义理、考证、辞章三分之说，并对王氏文集甚有期待，结果是王氏刊集，竟然不用姚序，令姚鼐情不能堪！其四，为表示自己亦深于考证，精通经学，姚氏撰《九经说》，以考论经说，然竟无人读其书。姚柬之曾论《九经说》：“容有未协于人意者，当先生存时已无人重之者。今先生下世二十八年矣，读者益寡。”① 考据学派诸家，在论学及引证时，也极少有人引用姚氏经说，其书始终被冷落。其五，即姚鼐所倡古文，亦并未达到“家家许郑”的盛况。姚氏弟子吴旋德曾曰：

> 方德旋年二十许时，见吾郡诸前辈言及古文，无不啧啧称姜侯、魏、汪、姜及董文友、邵青门诸子，而于望溪、海峰，曾不置之齿颊间。自皋文交王悔生，而后知古文之学在桐城。数十年来，学者稍稍称说望溪、海峰、惜抱三先生，为能学古人而得其正。然世人好三先生之文者，终不敌好侯、魏诸家之文之众。②

自乾隆至咸丰间，总集类书如徐斐然《国朝二十四家文钞》、石韫玉《国朝十家文》、朱珔《国朝古文汇钞》、吴翌凤《国朝文征》、李祖陶《国朝文录》与《续文录》等，其所选作家与古文，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等，或一篇不收，或略收数篇，皆不以其为大家，更不以之为文宗，故“天下文章出桐城”，亦仍不出桐城诸人自卖自夸而已。

因此，姚鼐终其一生都寂寞异常。他对于自己的考据成果也极为珍视，并希望得到考据学家的重视与褒扬。如对秦郡的考证，与钱大昕有异，姚氏自言“近时史学无过钱辛楣，然吾有所辩论，殆足俪之，恨吾书彼不得见耳”③。后钱大昕读姚鼐《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》，并复信称：“先生当代宗师，一言之出，当为后世征信。敢献所疑，幸明以示我。”④ 虽故为谦抑，但并不认同姚说。姚鼐讥刺钱氏所辨“于身心家国初无关涉，哓哓致辨，夫亦何为”⑤。实际姚氏也屡言此事，同样哓哓不已。

姚鼐既不得考据学家肯定，其经学考证诸书也不为学界所认可，其闷闷不平之情可知。他曾自谓：“鼐以生平用心所隐，冀相知于不可知之异世者，而竟得于同时乎！以四海之广，消然相望于旷邈沉寥之中，有不使更感叹而增欷者乎！”⑥ 类似的话语，在姚氏集中屡见。对姚鼐而言，最痛苦孤寂的不仅仅是终其一生也未得到像戴震在四库馆，或者钱大昕在江南那样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与话语权力，而且还为考据诸家所轻视，如同在空谷旷野发出强烈的呼喊声，都被消解在汉学大潮的风雨中。

① 姚柬之《伯山文集》卷八《书惜抱轩九经说后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49册，第133页。
② 吴旋德《初月楼文续钞》卷二《复耶溪书二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486册，第101页。
③ 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《与陈硕士》，下册，第18b页。
④ 《潜研堂集》卷三五《与姚姬传书》，第634页。
⑤ 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四《与刘东明》，上册，第12b页。
⑥ 《惜抱轩全集·文集》卷七《复东浦方伯书》，第81页。

六　钱大昕、汪中等人对方苞的蔑视

乾嘉考据学家，无论戴震、钱大昕还是其他诸家，皆未向姚鼐发难，或显斥其学。但他们对方苞，却自始至终没有好的评价，尤其以钱大昕、汪中为最。考据学家以郑玄为“素王”，但方苞对汉儒与郑玄深为不满。其曰：

> 汉儒之治经，莫勤于郑氏；然以莽事训《周官》，而于周公践阼，文王受命称王，皆笃信焉，而益漫其支流，况《毛序》、《孔传》之伪杂乎？世俗之贸儒，尚或以经说惟汉儒为有据，而诋程、朱为凭臆，非所谓失其本心者与？①

方苞此说，是建立在相信《周官》为刘歆伪造的基础上的。方氏主持三礼馆，以礼学称，著有《周官集注》十二卷、《仪礼析疑》十七卷与《礼记析疑》四十六卷，并皆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然考据学家对方氏礼学成果评价并不高。《四库提要》论曰：

> （《周官集注》）成于康熙庚子，后苞所著《望溪集》指《周官》之文为刘歆窜改，以媚王莽，历指某节某句为歆所增，言之凿凿，如目睹其笔削者。自以为学力既深，鉴别真伪，发千古之所未言，而究不免于臆断，转不及此书之谨严矣。②

《四库提要》对方苞《仪礼析疑》的评价要稍高些，虽然对其驳郑注提出反驳，但认为书中所论“皆细心体认，合乎经义，其他称是者尚夥，检其全书，要为瑜多于瑕也”③。对于方苞《礼记析疑》，《提要》举其删《文王世子》经文，是继承朱熹、王柏、吴澄删经之弊习，讥其“不师宋儒之所长而效其所短，殊病乖方”④。此几乎将其视为妄改经文的反面典型了。

按实论之，方苞词章有名当时，然其经学，后人不甚重之。如全祖望曰：“然世称公之文章，万口无异辞，而于经术已不过皮相之。”后来严元照甚至评论曰：“方公实无所谓经术，非皮相也。”⑤

钱大昕一生，少论人过，但对方苞的批评则非常严厉。钱氏曾引临川李绂（巨来）讥方苞所撰《曾祖墓铭》之说，以为今县以“桐”名者有五：桐乡、桐庐、桐柏、桐梓，不独桐城，而方苞文中省桐城曰“桐”，“‘……后世谁知为桐城者。此之不讲，何以言文！’望溪默然者久之，然卒不肯改，其护前如此”。又引金坛王若霖语曰：“灵皋以古文为时文，以时文为古文。”钱氏直称：“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。”⑥ 不仅如此，钱氏《与友人书》还直斥方苞。其曰：

> 前晤吾兄，极称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为最。予常日课诵经史，于近时作者之文，无暇涉猎，因吾兄言，取方氏文读之，其波澜意度，颇有韩、欧阳、王之规模，视世俗冗蔓獶杂之作，固不可同日语。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义法尔。……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，特世俗选本之古文，未尝博观而求其法。法且不知，而义于何有！昔刘原父讥欧阳公不读书，原父博闻，诚胜于欧阳，然其言未免太过。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。吾兄特以其文之波澜意度近于古而喜之，予以为方所得者，古文之糟粕，非古文之神理也。⑦

① 方苞著、刘季高校点《方苞集》卷一《书辨正周官戴记尚书后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上册，第34页。
② 方苞《周官集注》卷首《提要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，经部第101册，第1—2页。
③ 方苞《仪礼析疑》卷首《提要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经部第109册，第2页。
④ 方苞《礼记析疑》卷首《提要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经部第128册，第2页。
⑤ 全祖望著、朱铸禹汇校集注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卷一七《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上册，第305页。
⑥ 《潜研堂集》卷三一《跋方望溪文》，第2册，第564—565页。
⑦ 《潜研堂集》卷三三《与友人书》，第2册，第606—608页。

钱氏以为方苞所得为“古文之糟粕，非古文之神理”，而姚鼐则称“望溪先生之古文，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，天下论文者，无异说也”①。二人观点，可谓河汉悬远矣。

汪中对于时贤恒多否而少可，并大言：“吾所骂皆非不知古今者，盖恶莠恐其乱苗也。若方苞、袁枚辈，岂屑屑骂之哉！”② 此足见其对方、袁二氏之极度蔑视。方苞以礼学称，但汪氏针对方氏“家庙不为妇人作主”的观点，引《公羊传》等书中证据进行反驳，认为“妇人有主”③。即凌廷堪在与姚鼐讨论《司马法》版本问题时，也明确表示对“方望溪义法之说，终不能无疑也”④。至于江藩，则更是歪曲史料，将方苞刻画成一个既不学无术而又护己妒贤、气量狭窄的人，此已见前述。

姚鼐对钱、汪诸人的言论，当然不可能满意，对钱氏有所指责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至于汪中，姚鼐无所持论，但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，汪中子喜孙在钟山书院拜谒姚鼐，并欲人其门下，姚鼐用戴震当年对待他的方式，婉拒喜孙之请，并对汉学“搜求琐屑，征引猥杂，无研寻义理之味，多矜高自满之气”提出批评⑤。而对汉学诸家大事攻驳，为其师出头舒气者，则有方东树也。

七　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与方东树《汉学商兑》之编纂与影响

1.《汉学师承记》与《汉学商兑》的编纂动机与目的

乾隆初，随着官版《明史》修订完成与刊行，修《明史》不再成为有吸引力的话题。但当朝《国史·儒林传》应该以何标准编纂，将哪些学者置身其中，却颇多争议。如翁方纲主张“今日《儒林》之目，必以笃守程朱为定矩也”⑥。嘉庆十五年（1810），夺职在京的阮元自愿兼任国史馆总辑，纂辑《儒林传》，他向自己的好友焦循、臧庸、朱锡庚，弟子张鉴等人函札征求意见。焦氏以为：“太史公创《儒林列传》，推本孔子，尊崇‘六艺’，班氏踵之，所列之人皆经学也。”⑦ 因此，主张一以“经学”为准的。而阮元自己主张“崇宋学之性道，而以汉儒经义实之”⑧。这是站在官方立场上说话，貌似持汉宋之平，实际仍是以考据学为主。而江藩的《汉学师承记》正是在此氛围中产生的。

自乾隆中后期起，随着清廷开馆修《四库全书》，考据学达到鼎盛。在北京与江南，形成考据学两大中心，一时之间产生所谓“家家许郑”的局面。然而，无论是朝廷国史馆官修之书还是民间私撰之书，却都没有显示出考据学兴盛这一现实。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所撰之书，如魏裔介《圣学知统录》、汤斌《洛学编》、张夏《洛闽源流录》、熊赐履《学统》、张伯行《道统录》与《伊洛渊源续录》等，仍然是朱子《伊洛渊源录》之续编。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虽然从体裁上改变了叙事方式，但其所述仍是宋明理学之统绪，这显然不是江藩与考据学派所想看到的一代学术传记。

不仅如此，嘉庆时清王朝也由盛转衰。而与此形成正比的是，随着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完成，以及江永、惠栋、戴震、钱大昕这些具有领袖气度与典范作用的大师的凋谢，考据学家开始趋于在某一领域做窄而深的研究。考据学走向衰微，训诂碎屑、毛细罗列成为学界自夸与掩饰的另一种虚浮风气，学术界对考据学的抨击也日增一日。因此，在考据学派内部，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当代学术，分析利弊得失，其中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影响最大。

① 《惜抱轩全集·文后集》卷一《望溪先生集外文序》，第205页。
② 凌廷堪著、王文锦点校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三五《汪容甫墓志铭》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320页。
③ 汪中《述学内篇·妇人无主答问》，台湾广文书局1970年版，第13—14页。
④ 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二四《复姚姬传先生书》，第220页。
⑤ 《惜抱轩全集·文后集》卷三《复汪孟慈书》，第227页。
⑥ 翁方纲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一一《与曹中堂论儒林传目书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5册，第444—445页。
⑦ 焦循著、刘建臻点校《雕菰集》卷一二《国史儒林文苑传议》，广陵书社2009年版，上册，第213页。
⑧ 阮元著、邓经元点校《揅经室集·一集》卷二《拟国史儒林传序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，上册，第37—38页。

汉学的最终目的是“契夫先圣之微言，七十子后学之大义”①，此亦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“汉学”之大义。江藩书名“师承”有两层深意：一是远绍汉儒家法之学，即“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”；二是近述清儒传授源流，即“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”②。因此，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：用传记体史著之体裁，用正史儒林传史法，记述清朝汉学派学者之经学传授渊流与成就的一部当代学术史。由此可知，江藩编纂《汉学师承记》的目的，就是在道学传记类史著充斥的学界为汉学争地位，其着眼点并不是与桐城派争天下也明矣。

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并不主要针对桐城诸家，但方东树《汉学商兑》却以《汉学师承记》为标靶和取证材料，向汉学家发难。清中叶宗朱子者甚众，却为何是方东树纂辑《汉学商兑》，向汉学家发难呢？简单来说，可以归结为五个原因：一是方东树学宗朱子，以卫道者自居，不容他人对程朱理学有丝毫批评；而汉学家蔑视性理之学，奚落朱子。方氏对学术是非的判断，有着极深的门户之见，他衡量学人学说的标准，即是否尊奉程朱，“故见后人著书，凡与朱子为难者，辄恚恨，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”③。二是桐城学者以方苞为大宗，而汉学家蔑视方苞；即方东树之师姚鼐，也不受汉学诸家重视，落寞至极。这些积怨至方东树，终于爆发。三是方东树本人的性格，轻率易怒，喜好驳辩，争强斗狠。他曾自谓“余性轻脱率易，又精神短浅，虑患不深，疏放不慎，不但轻言易忿，即于阅人文字，及与人书札，尤草率轻易”。方氏归结为“坐果于自信，高识敏性”，自戒兼以自夸④。四是当时汉学大盛，并得到阮元等封疆大吏支持，令方东树感到极大的焦虑与不安。五是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等书在广州的刊行，以及阮元学海堂等的开办，直接刺激了方东树。

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末，《汉学师承记》八卷与《经师经义目录》一卷刊行；道光三年（1823）正月，阮元《揅经室集》刻成；同年，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再版，《宋学渊源记》初刊；四年十二月，学海堂建成；五年八月，阮元主持辑刻《皇清经解》。方氏在广州期间，曾上书阮元，希望他“正八柱而扫秕糠”，纠正汉学歪风，但未获理睬，倍受冷落⑤。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方东树的极度愤慨，成为方氏编纂《汉学商兑》与《书林扬觯》等书的直接动力。

2.《汉学师承记》的攻驳宋学与《汉学商兑》之批判汉学

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为汉学家树碑立传的同时，全面抨击宋学，不遗余力。《汉学师承记》开卷，对自先秦至明的经学史进行了简明的回顾，对宋明经学是完全否定的。其曰：

> 宋初承唐之弊，而邪说诡言，乱经非圣，殆有甚焉。如欧阳修之《诗》，孙明复之《春秋》，王安石之《新义》是已。至于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，不究礼乐之源，独标性命之旨，义疏诸书，束置高阁，视如糟粕，弃等弁髦，盖率履则有余，考镜则不足也。元、明之际，以制义取士，古学几绝，而有明三百年，四方秀艾，困于帖括，以讲章为经学，以类书为博闻，长夜悠悠，视天梦梦，可悲也夫！在当时岂无明达之人、志识之士哉，然皆滞于所习，以求富贵，此所以儒罕通人，学多鄙俗也。⑥

因此，江藩断然认为，魏晋以来，经术衰微，迟至“本朝，三惠之学盛于吴中，江永、戴震诸君继起于歙，从此汉学昌明，千载沉霾，一朝复旦”⑦。有鉴于此，江藩书中摒斥主张宋学的人物，不为立

① 王欣夫著，鲍正鹄、徐鹏整理《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·甲辰稿》卷三《松崖读书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下册，第1319页。
② 《汉学师承记笺释》卷一，上册，《国朝汉学师承记序》第4页。
③ 《书林扬觯》卷下《序纂》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9辑第15册，第49页。
④ 方东树《未能录》卷上《敬事五》，桐城方宗诚同治七年（1868）刻《仪卫轩全集》本，第3a页。
⑤ 方东树《考槃集文录》卷六《上阮芸台宫保书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07册，第227页。
⑥ 《汉学师承记笺释》卷一，上册，第12—15页。
⑦ 《汉学师承记笺释》卷一，上册，第34页。

传，同时在史料选择上，对宋学派人物所写传状、墓志等，一概不加参考。在同一史料中，选择对汉学有利之材料，删削对宋学有利之材料。例如阮元称王昶"治经与惠栋同深汉儒之学，《诗》、《礼》宗毛、郑，《易》学荀、虞；言性道则尊朱子，下及薛河津、王阳明诸家"①，而江藩采录时只录"从惠征君定宇游，于是潜心经术，讲求声音训故之学"②。此皆江氏有意为之。不仅如此，江藩还不惜歪曲史料来抬高汉学，例如前举凡涉方苞者，屡鄙薄之，以至肆意改篡史料。

江藩有明显的门户之见，宗汉而贬宋。而方东树《汉学商兑》则更是明火执仗，大肆攻驳汉学，可以称之为"汉学批判"，或者"汉学流毒大揭发大批判"。方氏曰：

> 此书本止一卷，首尾脉络相贯，以篇叶较多，分为三帙。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；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，似是而非者；次为总论，辨其诬诬唐宋儒先，而非事实者。③

案今《汉学商兑》一书，其中卷上六条，卷中上二十五条，卷中下二十五条，卷下十条，总六十六条，间有同一条中列引汉学家数家之说者，先列汉学家观点，然后逐条批驳，并为宋儒辩护，最后为"总论"，即是方氏全书攻击的核心。他综论汉学诸家攻宋儒之弊曰：

> 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，著书以辟宋儒、攻朱子为本，首以言心、言性、言理为厉禁。海内名卿巨公，高才硕学，数十家递相祖述，膏唇拭舌，造作飞条，竞欲咀嚼。究其所以为之罪者，不过三端：一则以其讲学标榜，门户分争，为害于家国；一则以其言心、言性、言理，堕于空虚心学禅宗，为歧于圣道；一则以其高谈性命，束书不观，空疏不学，为荒于经术。④

围绕此"三端"，方氏在《汉学商兑》中，引证立说，反复诘难；且不惮繁冗，又析之为汉学家"六蔽"，并兼具"七识"⑤。所谓"六蔽"，也就是上述"三端"再重言叠语而已。在总结"六蔽"之后，方东树进而痛责曰：

> 今汉学家首以言理为厉禁，是率天下而从于昏也。拔本塞源，邪说横议，较之杨、墨、佛、老而更陋，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。何者？洪水猛兽害野人，此害专及学士大夫。学士大夫之学术昧，则生心发事害政，而野人无噍类矣。⑥

方东树对清代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全面否定，而攻击最力的则是汉学研究为世所认可的小学、训诂、名物、典制诸方面的成就，尤其是汉学家治《说文》及古音分部等。如《汉学商兑》初刊本中，还称赞"近人说经，无过高邮王氏《经义述闻》，实足令郑、朱俯首，自汉唐以来，未有其比也"⑦。此段文字为后世研究者所广泛称引，但世人不知在方氏后来所撰《汉学商兑刊误补义》中，已将此段删汰。他对汉学家小学成就的些微肯定，也是说他们"皆本之宋儒"⑧。

3.《汉学师承记》与《汉学商兑》各自的影响

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对自清初至清中叶汉学之学术渊源、师承关系、学术宗旨、代表人物及成就得失等，用传统传记体进行了详尽的论述，是最早对清代汉学进行全面总结与评价的专著。清季李慈铭称其书"谨守汉学，不容一字出入，殊有班氏《儒林传》、《艺文志》家法"⑨。黄式三认为："凡前儒经说之创获者，覼缕述之，不矜裁削，于后儒所讲起收虚实之法不拘焉。后之为《艺文志》、《儒林

① 《碑传集》卷三六《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》，第3册，第1063页。
② 《汉学师承记笺释》卷四《王兰泉先生记》，上册，第336页。
③ 方东树《汉学商兑》，《万有文库》本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，《序例》第4页。
④ 《汉学商兑》，《万有文库》本，《序例》第1页。
⑤ 《汉学商兑》卷下，《万有文库》本，第149—150页。
⑥ 《汉学商兑》卷下，《万有文库》本，第161页。
⑦ 方东树《汉学商兑》卷中之下，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初刻本，第33b页。
⑧ 《汉学商兑》卷下，《万有文库》本，第164—165页。
⑨ 李慈铭著、由云龙辑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，上海书店2000年版，第478页。

传》者，将必取法于是也哉。"① 后来如梁启超、章炳麟、支伟成、钱穆等近现代人有关清代学术与思想的著述，莫不受江藩影响，台湾周骏富主编《清代传记丛刊》以《汉学师承记》为首选，足以说明该书在清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与作用。是书出版至今，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，据笔者统计已经有六十余种不同的版本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其作用与影响。

对《汉学师承记》持批评意见者，主要是从江藩有门户之见、立例不严、篡改史料、记载有失以及过分关注扬州学者等方面切入，而发难最多者，则为方东树。如其论曰：

> 江藩曰：顾亭林、黄太冲，"两家之学，皆深入宋儒之室，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。多骑墙之见，依违之言，岂真知灼见者哉"云云。意甚憾其不专宗汉学，已为谬见。又称其深入宋儒之室，益为无见之谈。以余论黄、顾二君，盖得汉学之精，而宋学之粗者也。如江氏、惠氏，乃拾汉学之渣秽者也。后有真儒，必以余言为信。②

方东树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说话，所以指斥江氏为"汉学之渣秽"。

反观方东树《汉学商兑》一书，初刊于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，后来受曾国藩表彰与支持，经方宗诚校定，由吴棠、涂宗瀛等分别再刊，一时传布大江南北，是书至今亦有二十余种版本行世。对此书的作用与影响，学术界向来肯定者有二：一是《汉学商兑》的出版，给汉学以沉重一击，导致其从此衰微；二是受《汉学商兑》的影响，学术界主张汉宋调和的呼声日渐强烈。

前一种观点，源自方东树子方闻、侄弟子方宗诚等，认为自《汉学商兑》出，"于是汉学之气焰始衰。虽崇尚之者，亦无敢公然诋毁矫诬矣。嘉道间海内著述有功于圣道者，以此为第一"③。此后学术界即以为，汉学衰微与《汉学商兑》的出版有密切的关系。而民国以来学术界则多以为该书的面世，使人们认清了汉学的流弊，开始走向汉宋调和。如梁启超称方东树"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，奋然与抗，亦一种革命事业也"④。林庆彰谓"方氏的说法，为后来的汉宋之争或汉宋调合起了引导作用"⑤。又王汎森谓"在《汉学商兑》出版半世纪后，人们还是把它当做是要求汉宋融合的嚆矢"⑥，等等。

客观而言，方东树对汉学的攻驳，的确使人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汉学弊病丛生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，但也非常有限。因为对汉学家的攻驳，并非始于姚鼐、方东树等人，而早在他们之前的袁枚、翁方纲、章学诚诸人，就已经对汉学弊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。同时，在汉学家内部如戴震、钱大昕、段玉裁、焦循、凌廷堪、阮元诸人，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汉学弊端并进行纠偏。因此方东树在批评汉学方面并非先行者，而且其攻驳也无新意可言，因此称其为"革命事业"，显有夸大的嫌疑。

清代汉学发展到道光时期，早已过了全盛期。汉学的两大中心是北京与江南，随着《四库全书》的纂成与惠栋、戴震、钱大昕、段玉裁、王念孙等人的凋谢，加之"太平天国"的扫荡，江南的南京、苏州、扬州、杭州等地藏书之家，经兵燹焚余之后，书籍流散，故家毁亡，汉学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。随着湘军的挺进江南，曾国藩、皮锡瑞、王先谦、叶德辉等人继起，湘学成为学术界的新兴力量；今文经学兴起，学者研究《公羊》、三家《诗》与诸子学等蔚然成风；而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家国兴亡的刺激，研究西北地理、海国疆域等方面的专题，成为时尚。汉学早已不复乾嘉全盛期的光景，已经走向了衰微。所以，汉学衰微与《汉学商兑》的攻驳，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。

就汉宋调和而论，事实上主张此说也不始于阮元，乾隆朝纪昀等人就主张汉宋持平与调和，但这

① 黄式三《儆居集》卷四《子集三·读江氏隶经文》，清道光刻本，第31b页。
② 《汉学商兑》卷上，《万有文库》本，第22页。
③ 方宗诚《柏堂师友言行记》卷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540册，第552页。
④ 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58页。
⑤ 林庆彰《方东树对扬州学者的批评》，载《清代经学研究论集》，台湾"中央研究院"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，第372页。
⑥ 王汎森《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》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版，第22页。

只不过是一种官方味道的说辞而已，实际二人皆汉学中人，崇汉而弃宋。而且事实是方东树上书阮元，并未得到阮氏支持，更不存在阮氏受方东树的影响而转变观念的情况①。即便勉强说主张义理、考证、词章、经济四分说的曾国藩等，受《汉学商兑》的影响，但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汉宋调和甚至融合。清季与民国初始，家国巨变，国将不国，学术界在找寻清朝衰亡与国力不济的原因时，认为汉学的发达与学者埋头考据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因由，因此对汉学进行全面清算，而《汉学商兑》的适时流传，以及书中的极端攻击的言论，足以满足各方厌恶汉学的需要，达到了戏剧性的"效果"，所以将其书的作用进一步夸大。究其实，汉学衰微与汉宋调和等，与《汉学商兑》并无直接关联。

八　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综论

1. 汉学家与桐城诸家争执中的攻守形势——究竟是谁攻谁守？

前已述之，近今人认为桐城学者与考据家交恶，或埋祸于江永、方苞之论礼不合，或始于戴震、姚鼐之"拜师事件"，或爆发于江藩、方东树之交相攻击。甚或以为在乾隆朝戴震卒后的三十年里，汉学家面对姚鼐等人的攻击，或沉默，或轻蔑，或隐忍，或采取守势应对。如朱维铮曰：

> 应该说，在戴震于一七七七年去世后，姚鼐对他进行猛烈抨击，甚至辱及人身，而戴门弟子和朋友都报以沉默。……在那些潜心考证的汉学家看来，此辈依仗权势，"本未得程朱要领，徒援引肤末，大言自壮"，岂足与校？以无言示轻蔑，自在意中。……（姚卒）他有没有想到桐城派已被众多"崇学之士"，下意识地排除在"国朝宋学"之外？人们不得而知。但汉学家在忍受他和他的支持者攻讦四十年后，已难以继续隐忍，则也是事实。
>
> 从清学史的角度来看，从戴震去世以后的三十多年间，汉学家面对讲道学者的种种攻击，总的说来是采取守势，避免直接论战。江藩二书刊行，才算他们对于这类攻击的首次全面回应。……读江藩二书，令人感到意外的，并非他以桐城诸家为回应对象，而是他的回应，同在前的姚鼐、在后的方东树相较，可说是够温和的。他指名批评对手，不过在《汉学师承记》和附录中，各出现一次，只点方苞一人；《宋学渊源记》没有点到桐城、阳湖诸家任何姓名。但也许正是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，激怒了姚鼐四门徒之三的方东树。②

这段话叙述汉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，给读者造成如下印象：一是在戴震卒后，桐城派气盛，而汉学派无论是"沉默"还是"轻蔑"，总之是隐忍吞声四十年，至江藩纂《汉学师承记》终不能默，方起而回应；二是在乾隆朝，自始至终存在着严重的汉、宋对立与争执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势同水火，且桐城诸家大有凌驾于汉学诸家之上的态势。

有意思的是，方东树在《汉学商兑》中，也有意识地制造气氛，绘声绘色地描摹出汉学派气势汹汹、持械来犯的惊险战争场面。其论汉学家曰：

① 如王汎森以为《汉学师承记》与《汉学商兑》皆由阮元刊刻，并称"有趣的是，针锋相对的两本书都由阮元所刊行，这或许象征着阮元后来逐渐显露出的一种同时包容汉宋之学的趋向"，且以为这"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了"（详参王氏《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》一文，载《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》，第11—12页）。案此说无据，实际方东树并未得到阮元的支持，方宗诚谓东树以书上之，而阮元"不悟"（方宗诚《柏堂集前集》卷七《仪卫先生行状》，光绪六年刻《柏堂遗集》本，第8a页）。况道光六年（1826）六月十三日，阮元接部咨奉上谕赴云贵总督任，时《汉学商兑》尚未完稿，更不可能刊行。笔者据方东树《汉学商兑刊误补义》等考证，《汉学商兑》在道光四、五年间（1824—1825），有部分成稿，此后不断修改，于十一年方才初刊，与阮元没有任何的关联（详参拙文《方东树〈汉学商兑〉新论》，《文史哲》2013年第2期）。

② 《汉学与反汉学——江藩的〈汉学师承记〉、〈宋学渊源记〉和方东树的〈汉学商兑〉》，载朱维铮《求索真文明——晚清学术史论》，第24—28页。

> 举凡前人所有成说定论，尽翻窠臼，荡然一改，悉还汉唐旧规，祧宋而去之，使永远万世，有宋不得为代，程朱不得为人，然后为快足于心。大抵以复古为名，而宇内学者，耳目心思为之一变。不根持论，任意讥弹，颠倒是非，欺诬往哲。当涂者树名以为招，承流者怀利以相接，先进者既往而不返，后起者复习俗而追之。整兵骇鼓，壁垒旌旗，屯营满野，云梯、火牛、厌胜、五禁之术，公输、墨翟、田单、郦生之俦，纵横捭阖，苏、张游说之辨百出。新学小生，本无是非之心，亦无恩仇之报，但随俗波靡，矜名走利，相与哆口睒目，曳梃攘臂而从之。扬风纵燎，欲以佐斗，为鏖战而决胜，灭此朝食，廓清独霸。而程朱之门，独寂然不闻出一应兵。夫习非胜是，偏听成惑，若守文持论，败绩失据，吾恐此道遂倾矣。①

方东树竭力描绘汉学家气势汹汹地扛着十八般兵器来袭，大有席卷碾压之势，"而程朱之门，独寂然不闻出一应兵"，"败绩失据"，此道将倾。这与朱维铮的说法，同一事件，恰成对立。那么历史事实竟如何呢？是否真存在双方强攻强守，或者攻守易势的局面呢？

2. 汉学家与桐城诸家的对抗——一场"关公战秦琼"式的假想战争

为方便论述，我们再将考据学家与桐城诸家代表人物与标志性事件，按时间顺序罗列如下：

乾隆五、六年间（1740—1741），江永与方苞在京师讨论礼学；二十年，戴震、姚鼐相识，姚恭请入戴氏门下，戴谦辞谢之；也在此前后，戴氏提出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分之说，刻《考工记图》行世；二十二年，戴震在扬州，作《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》，赞同惠氏有关汉学的主张；三十八年，朝廷开四库全书馆，戴、姚皆入馆充纂修官；翌年秋，姚解官归，并撰《赠钱献之序》，向汉学家发起挑战；四十一年，姚鼐主扬州梅花书院；四十二年五月，戴震卒于北京，也恰在是年，姚鼐作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，桐城派呼之欲出；四十五年，姚氏纂《古文辞类纂》成；嘉庆二年（1797），《九经说》十二卷刻成；十五年，作《程绵庄文集序》，严斥戴震；二十年，姚鼐以八十五岁高龄卒于江宁；二十三年，江藩赴广东主修《广东通志》，刊行《汉学师承记》与《经师经义目录》；翌年，方东树亦应邀赴粤分纂《广东通志》；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江氏《汉学师承记》再版，《宋学渊源记》初刊；四年十二月，阮元学海堂建成，诸生治学其中，汉学气氛浓盛；五年八月，阮元主持辑刻《皇清经解》；十年，江藩卒；十一年，方氏《汉学商兑》初刊；十七年，方氏赴广东邓廷桢幕中；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方东树以八十岁卒于里中。

根据前文论述与以上时间线索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：第一，江永、方苞在京师论礼，并无不合，所谓方苞"负气不服"，纯属江藩篡改史实，为子虚乌有；第二，姚鼐欲入戴震门下，震谦辞谢之，在当时人及戴、姚二人看来并无不妥，属正常现象；第三，戴震生前，对姚鼐仍相当器重，虽然有学术争论，但双方有正常的学术交往，亦未因"拜师事件"而交恶，但戴震从此成为姚鼐心中挥之不去的"影子"，为日后攻驳戴氏埋下胎基；第四，姚鼐在四库馆，曾与戴震等辨汉宋之别，维护程朱理学，并撰《赠钱献之序》，向戴震、钱大昕诸人发起挑战，但不获理睬，面对汉学一统之局，姚氏深感势孤力单，遂辞官归里；第五，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，戴震卒，而恰好此年姚鼐初竖"桐城派"旗帜，并于此后厉词攻驳戴震；第六，姚鼐生前乃至嘉庆末年，无论影响还是著述流传，都未达到"天下文章在桐城"的程度；第七，江藩与方东树在广东阮元幕中，亦曾一起论学，方东树称："江藩尝谓余曰：'吾文无他过人，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。'"② 这让方东树极感不快，但二人生前亦并未有激烈的争论；第八，道光十年（1830），江藩卒，而翌年方氏《汉学商兑》才刊行面世。

因此，无论是巧合还是其他原因，戴、姚、江、方诸人以及他们著述面世的时间，恰如走马灯般"你方唱罢我登台"。从个人交往与代表性事件来看，乾嘉间并无桐城诸人与考据学家的严重对立，不

① 《汉学商兑》卷下，《万有文库》本，第147页。

② 《汉学商兑》卷下，《万有文库》本，第146页。

存在当面交锋、唇枪舌剑的学术辩论，更未到“大打出手”的程度，汉学诸家自惠栋、戴震、钱大昕以还，也未曾与桐城诸家或其他宋学人物有过擂鼓攻杀的血战场景。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桐城尚未成派，难以自成一军；另一方面汉学家从未将姚鼐等视为攻驳之对象。方东树描写的汉学家大举进犯的热闹场面，也是他竭力烘托出来的战场效果；而方氏《汉学商兑》也不过是自设擂台，赤膊上阵，空拳击影的独角戏。后人论桐城派与考据学家角力相抗，你死我活，也不过是一场“关公战秦琼”式的想象与造势而已。

九　乾嘉时期汉、宋之争的形势与结局

在乾隆朝汉学兴盛后，汉、宋之争时显时隐，但的确一直存在，并且相当激烈。或站在程朱理学立场上，或在考据与义理之争中以义理为尚的学者，代表人物有钱载、袁枚、翁方纲、彭绍升、姚鼐、程晋芳、章学诚等。钱载并无明确的学术主张，姚鼐观点已见前述，彭绍升不过是一位佞佛的居士，而章学诚之说也为学界熟知，在此我们以袁枚、翁方纲、程晋芳为主，试论述如下。

1. 袁枚与考据学家之间的公开争论

乾嘉时期的学术界，旗帜鲜明地全盘否定考据学并与考据学家发生激烈冲突者，实际仅袁枚一人而已。首先与袁枚发生争论的是惠栋，惠氏曾函札劝告袁枚以“穷经为勖”，虑其“好文章，舍本而逐末”①。但袁氏却不认同，其回札曰：

闻足下与吴门诸士，厌宋儒空虚，故倡汉学以矫之，意良是也。第不知宋学有弊，汉学更有弊，宋偏于形而上者，故心性之说近玄虚；汉偏于形而下者，故笺注之说多附会。虽舍器不足以明道，《易》不画，《诗》不歌，无悟入处。而毕竟乐师辨乎声诗，则北面而弦矣；商祝辨乎丧礼，则后主人而立矣。艺成者贵乎？德成者贵乎？而况其援引妖谶，臆造典故，张其私说，显悖圣人，笺注中尤难偻指。宋儒廓清之功，安可诬也！②

袁氏如此侮谩汉儒，蔑弃笺注，当然是惠栋所难以接受的，故惠氏再次回信论袁氏云“士之制行，非经不可，疑经者非圣无法”。此说显然也激怒了袁枚，他复信论“六经中惟《论语》、《周易》可信，其他多可疑。疑，非圣人所禁也”。并讥刺惠氏《读大礼议》、《六宗说》等文袭毛西河、郝京山之说，请其“毋以说经自喜”③。

不仅如此，袁枚还以“考据”与“著作”中分学术，认为“钞摭故实为考据，抒写性灵为著作”④。他说：

著作之文形而上，考据之学形而下。各有资性，两者断不能兼。⑤

一主创，一主因；一凭虚而灵，一核实而滞；一耻言蹈袭，一专事依傍；一类劳心，一类劳力：二者相较，著作胜矣。且先有著作而后有书，先有书而后有考据。以故著作者，始于“六经”，盛于周、秦；而考据之学，则自后汉末而始兴者。郑、马笺注，业已回冗，其徒从而附益之，抨弹踳驳，弥弥滋甚。孔明厌之，故读书但观大略；渊明厌之，故读书不求甚解。二人者，一圣贤，一高士也。余性不耐杂，窃慕二人之所见，而又苦本朝考据之才之太多也。盍以书之备参考者尽散之！①

袁枚将著作、考据加以比较，一前一后，一褒一贬，并将考据学之范围划为“备参考者”，即钞撮辑佚之学。袁氏提倡“性灵”，而考据学家却对此说极为反感。尽管此“性灵”非彼“性灵”，但考据学家认为，自晚明钟惺、谭元春等人标榜“性灵”，以五七言之法解经，适足以乱经。袁枚之说，招致汪中、焦循、凌廷堪、孙星衍等人的攻击。

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述，传旧而已；作，则创始也。”沈彤在同方苞讨论二者之关系时云：

《六经》之所未尝言而能言之，言之而有裨于《六经》之道；《六经》之所尝言而能开之演之，开之演之而大显乎《六经》之旨。若是者，皆谓之立言，一倚焉一不倚焉耳。《传》曰：“作之者谓之圣，述之者谓之明。”倚不倚虽有异，其为立则均也。②

沈彤将前人作高于述的观点加以改变，使二者在立言上居于平等的地位，也就是说推阐义理是立言，而考核训诂同样是立言。而焦循更指出，记述更非易事，其《述难》云：

孔子之世，所作于前者，已无不备，孔子从而明之，使古圣人之教续延于万世，非不作也，时不必作也。……宋、元以来，人人读孔子之书，皆自以为述孔子，而甲诋乙为异端，乙斥甲为杨、墨，究之孔子所以述伏羲、神农、尧、舜之教者，果有能得之者乎？述孔子者，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？吾知其难矣。③

尽管如此，但焦循却对“考据”一词视如仇寇，极言其称之不当。他说：“自周秦以至于汉，均谓之学，或谓之经学，无所谓考据也。”焦氏接着又说：

本朝经学盛兴，在前如顾亭林、万充宗、胡朏明、阎潜邱，近世以来，在吴有惠氏之学，在徽有江氏之学、戴氏之学，精之又精，则程易畴名于歙，段若膺名于金坛，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，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。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，不下数十家，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，是直当以经学名之，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？若袁太史所称，择其新奇随时择录者，此与经学绝不相蒙，止可为诗料、策料，在“四部”书中为“说部”，世俗考据之称，或为此类而设，不得窃附于经学，亦不得诬经学为此概以“考据”目之也。④

焦氏此文是写给孙星衍的信，一则批驳袁枚，二则有劝告孙氏之意，因为孙星衍是同意用“考据学”一词的，但孙氏所论考据学也不同于袁枚所论之考据学。孙星衍在同袁枚书信争执的同时，又给凌廷堪写信告知此事。凌氏回书论云：

窃谓近者学术昌明，士咸以通经复古为事，本无遗议。而一二空疏者流，闻道已迟，向学无及，遂乃反唇集矢，谓工文章者不在读书，瀹性灵者无须考证。此与卧嚣桑而侈言屏膏粱，下蚕室而倡论废昏礼者何异。不知容有拙于藻缋之儒林，必无昧于古今之文苑也。来教所云某君者，其弊似亦类此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者也。⑤

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正好说明了凌廷堪等人与袁枚之间水火不容的观点，不存在求同存异之处，但袁枚仍坚执自己的观点，孙星衍信札与其争论，为“考据”二字反覆辨证，袁氏颇为厌倦地讽刺说：“如再有一字争考据者，请罚清酒三升，飞递于三千里之外，何如？”⑥袁氏还有讽刺考据学长诗曰：

东逢一儒谈考据，西逢一儒谈考据。不图此学始东京，一丘之貉于今聚。《尧典》二字说万

① 袁枚著、王英志校点《袁枚全集·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一八《答惠定宇书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2册，第305页。
② 《袁枚全集·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一八《答惠定宇书》，第2册，第306页。
③ 《袁枚全集·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一八《答定宇第二书》，第2册，第306—308页。
④ 孙星衍著、骈宇骞点校《问字堂集》卷四《答袁简斋前辈书》，中华书局1996年版，第90—91页。
⑤ 《袁枚全集·小仓山房续文集》卷二八《〈随园随笔〉序》，第2册，第497页。

① 《袁枚全集·小仓山房续文集》卷二九《散书后记》，第2册，第505—506页。
② 沈彤《果堂集》卷四《与望溪先生书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264册，第371页。
③ 《雕菰集》卷七《述难（一、二）》，上册，第133—134页。
④ 《雕菰集》卷一三《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》，上册，第246—247页。
⑤ 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二四《答孙符如同年书》，第215—216页。
⑥ 《问字堂集》卷四《答袁简斋前辈书》附袁氏《答书》，第93页。

言，近君迷入公超雾。八寸策讹八十宗，遵明蝎蝎强分疏。或争《关雎》何人作，或指明堂建某处。考一日月必反唇，辨一郡名辄色怒。干卿底事漫纷纭，不死饥寒列章句？专数郢书燕说对，喜从牛角蜗官赴。我亦偶然愿学焉，顷刻挥毫嘶生趣。捋扯故纸给成篇，弹弄云和辄胶柱。方知文字本天机，若要出新先吐故。鲁人无聊把沈拾，齐士谈仙将影捕。作《尔雅》非磊落人，疏《周官》走蚕丛路。当时孔圣尚阙疑，孟说井田亦臆度。底事于今考据人，高睨大谈若目睹？古人已死不再生，但有来朝无往暮。彼此相殴昏夜中，毕竟输赢谁觉悟。次山文碎皇甫讥，夏建学琐乃叔恶。男儿堂堂六尺躯，大笔如椽天所付。鲸吞鳌掷杜甫诗，高文典册相如赋。岂肯身披腻颜夹，甘逐康成车后步！陈迹何妨大略观，雄词必须自己铸。待至大业传千秋，自有腐儒替我注。或者收藏典籍多，亥豕鲁鱼未免误。招此辈来与一餐，锁向书仓管书蠹。①

这是袁枚七十岁时所作，后来初刻《小仓山房文集》，大概是迫于考据学派的压力，并未收录此诗，但袁枚的观点自始至终并未发生任何的改变。

2. 翁方纲对汉学的批判

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中，曾将翁方纲也挂名在汉学家之列，此则因其与考据学家多有往来，且治金石诸学。但翁氏之学，却以义理为上，尊奉程朱。其曰：

考订之学，以衷于义理为主。其嗜博嗜琐者非也，其嗜异者非也，其矜己者非也。……凡所为考订者，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。②

在谈到惠栋等人治汉《易》时，翁氏讥刺曰：

此所谓汉学者，事经千载以前，付之不论可耳。乃近日惠栋撰《易述》，亦多仿效之。即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《系下》云乾为百，坤为姓，其文理不通，谬妄至于此极，而嗜异者犹称其书，何也？③

又曰：

近日学者于《易》学既不能虚衷研核诸家之说矣，顾转欲高谈荀、虞者，盖徒欲立异于《程传》、《朱义》之外，故为此以矫之耳。④

在论及戴震与钱载的争执时，翁氏做出持其平的态度。但他又批评汉学曰：

诂训名物，岂可目为破碎？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，然后能讲义理也。宋儒恃其义理明白，遂轻忽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，不几渐流于空谈耶？况宋儒每有执后世文字习用之义，辄定为诂训者，是尤蔑古之弊，大不可也。⑤

翁方纲认为："学者束发受书，则由程朱以窥仰圣籍，及其后见闻稍广，而渐欲自外于程朱者，皆背本而骛末也。"翁氏也承认宋儒"学不富"，那么"吾今既知朴学之有益博综考订，勿蹈宋后诸家之弊，则得之矣"⑥。他批评戴震"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，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"⑦。他对卢文弨比较认可，因为"予不惟君之精且博是叹，而独叹其弗畔于朱子也"⑧。因此，翁氏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

① 《袁枚全集·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一《考据之学莫盛于宋以后，而近今为尤。余厌之，戏仿太白〈嘲鲁儒〉一首》，第1册，第733页。
② 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七《考订论上之一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82册，第74页。
③ 翁方纲《苏斋笔记》卷一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4辑第9册，第182页。
④ 《苏斋笔记》卷一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4辑第9册，第187页。
⑤ 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七《附录与程鱼门平钱戴二君议论旧草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82册，第81页。
⑥ 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六《自题校勘诸经图后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82册，第70页。
⑦ 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七《理说驳戴震作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82册，第80页。
⑧ 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一二《送卢抱经南归序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82册，第123页。

"穷经以博综汉学，而归于勿背程朱为主"①，义理为上，考据次之。所谓"天下古今，未有文字不衷于义理者也"②，"凡为学之要，自必以恪守程朱为正路也"③。

3. 程晋芳对汉学的批判

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录程晋芳入汉学家之中，盖因其为江都人，又与朱筠关系亲密，与当时治汉学者多有往还之故，但实际程氏学术主张在宋学而不在汉学。程氏有《周易知旨编》三十卷，今不传。晋芳论《易》，力主王弼注并参以宋儒之说。其曰：

独念《易》经辅嗣之廓清，又得康伯、仲达纂续疏解，宋贤辈出，大义愈明。我朝安溪讲肄于前，家绵庄剖晰于后，凡诸乘承比应之拘牵，阳位阴位之傅会，与夫互卦、卦气、卦变、方圆、先后、图位，固已一举而空之，宜乎四圣人之心思昭揭千古矣。而三十年来学士大夫，复倡汉学，云《易》非数不明，取辅嗣既扫之陈言，一一研求，南北同声，谓为复古，使其天资学力果能上逮九家，吾犹谓之不知《易》也。况复好奇骋异，志在争名，徒苦其心，自堕于茫昧之域，不可叹耶？且六十四卦象既备矣，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所发挥数可知矣，而学者必欲于所既有之外，阐所本无，曰不知数无以知来也。噫！诸君子穷极汉学，果克知来也耶？④

又程氏《礼记集释序》曰：

天之生宋贤也，既使彰孔、孟之绝学以昭示来兹，又使阐注疏未罄之藏刮垢而磨光，使人不蔽于章句，而又将开数百年制艺之学，为士子登仕之阶，故其所著书，不独理明典备，亦简括易读，假使以注疏为功令，俾士子习以作时文，必有难于措手者矣。⑤

这与汉学家观点完全不同。程晋芳《正学论》七篇，详论其学术观点，言程朱之学为正，陆王为偏，又论当时汉学诸家之弊，皆时人所不言者。如其指责汉学家曰：

劳劳终日，惟外之求，而不知身心性命之所在。试之以事，而颠顿茫昧，鲜不陨越；临之以恐惧患难，而失所操持。由其玩物丧志在平时，故了无肆应曲当之具。以此为儒，果足为程朱供拼扫役乎？⑥

程晋芳还将学者分为儒者与学人儒两类，"有儒者，有学人"⑦，二者用处不同，然以儒者为高。此即古人所谓人师、经师之别，亦即义理、考据之别和宋、汉之别，这显然也与考据学家的观点更是大相径庭的。

4. 汉、宋之争的形势——"一盘散沙"对"一块铁板"的战争

综而论之，乾嘉时期的汉、宋之争，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为：

第一，主宋学者以为，程朱理学为不易之真理，乃道统之正极，即方东树所谓"孔子订六经，收拾上古以来；唐人定注定本作疏，收拾汉魏八代以来；朱子集《四子书》，订周、程、张诸儒之说，直接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以来。是为古今三大治"⑧。而汉学家以为："经术一坏于东、西晋之清谈，再坏于南、北宋之道学，元、明以来，此道益晦。"⑨

第二，宋学者以卫道者自任，攻驳汉学家最力的就是他们不尊程朱，离经畔道，"专与宋儒为水

① 陈用光《太乙舟文集》卷五《寄姚先生书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489册，第592页。
② 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七《考订论上之二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82册，第75页。
③ 《苏斋笔记》卷一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4辑第9册，第184页。
④ 程晋芳《勉行堂文集》卷二《周易知旨编序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43册，第449页。
⑤ 《勉行斋文集》卷二《礼记集释序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43册，第452页。
⑥ 《勉行堂文集》卷一《正学论四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43册，第440—441页。
⑦ 《勉行堂文集》卷一《正学论五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43册，第441页。
⑧ 《书林扬觯》卷下《著书说经》，第32页。
⑨ 《汉学师承记笺释》卷一，上册，第34页。

火”，“名为治经，实足乱经；名为卫道，实则畔道”①。而汉学家并不避讳这一点，如惠栋称“栋则以为宋儒之祸，甚于秦灰”，戴震谓“酷吏以法杀人，宋儒以理杀人”，江藩称宋儒“邪说诡言，乱经非圣，殆有甚焉”。

第三，宋学者讥汉学家小道破碎，弃本贵末，所谓“众口一舌，不出于训诂、小学、名物、制度。弃本贵末，违戾诋诬，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，一切抹杀”；汉学家讽宋学者空疏无本，虚理凿空，“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，不究礼乐之源，独标性命之旨，义疏诸书，束置高阁，视如糟粕，弃等弁髦，盖率履则有余，考镜则不足也”②。

宋学派以为，汉学家最大之阴谋，就是要“祧宋儒之统”，故道统所系，卫道之士不得不争；汉学家则以为，汉儒上承孔孟，为学统正脉，魏晋以来，经学淆乱，必欲正学，则汉学不得不复。

但双方也有交汇共通之处，这表现在：第一，宋学者以为义理至高无上，其实汉学家的最高境界也是义理，即戴震所谓之“大本”，如王鸣盛分学术为四类，其云：“譬诸木然：义理，其根也；考据，其干也；经济则其枝条；而词章乃其葩叶也。譬诸水然：义理，其原也；考据，其委也；经济则疏引溉灌，其利足以泽物；而词章则波澜沦漪，潆洄演漾，足以供人玩赏也。四者皆天下之所不可少，而能兼是者，则古今未之有也。”③ 所不同者，宋学者所谓义理即程朱理学，而汉学家所主张的义理，并非程朱理学。

第二，当时主宋学者，翁方纲、姚鼐、章学诚诸人，虽然观点并不一致，但并不全盘否定考据，并与考据诸家多有往来。如姚鼐谓：“天下学问之事，有义理、文章、考证三者之分，异趋而同为不可废，一涂之中，歧分而为众家，遂至于百十家。”④ 其弟子陈用光更言：“本朝之有考据，诚百世不可废之学也。”⑤ 完全否定考据之学者，唯袁枚一人而已。

第三，考据学家对宋代经学采取否定态度，对程朱理学则一分为二，否定其道学，而对其正心诚意之学，则并不否定，树为楷模。江藩《宋学渊源记》前论曰：

> 儒生读圣人书，期于明道，明道在于修身，无他，身体力行而已，岂徒以口舌争哉！……近今汉学昌明，遍于寰宇，有一知半解者，无不痛诋宋学。然本朝为汉学者，始于元和惠氏，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“六经尊服、郑，百行法程、朱”，不以为非，且以为法，为汉学者背其师承，何哉！藩为是记，实本师说。⑥

此与所谓“经师”、“人师”之分，“道问学”与“尊德性”之争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惠栋曾谓：“汉人经术，宋人理学，兼之者乃为大儒。荀卿称周公为大儒，大儒不易及也。”⑦ 又说：“自古理学之儒，滞于禀而文不昌；经术之士，汨于利而行不笃。”⑧ 这正是惠氏将“六经尊服郑，百行法程朱”书为楹联而父子皆遵行不悖的思想背景和合理解释。

就当时的争论而言，汉学家虽然被后世分为吴、皖两派，其学术观点与治学方式也并不尽同，但他们尊崇汉儒、反对宋学，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，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；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；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；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受到排斥，在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

① 《汉学商兑》，《万有文库》本，《序例》第1页。
② 《汉学师承记笺释》卷一，上册，第12页。
③ 王鸣盛《西庄居士始存稿》卷二五《王戆思先生文集序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34册，第327页。
④ 《惜抱轩全集·文集》卷七《复秦小岘书》，第80页。
⑤ 陈用光《太乙舟文集》卷五《寄姚先生书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489册，第590页。
⑥ 江藩著、钟哲整理《国朝汉学师承记（附：国朝经师经义目录、国朝宋学渊源记）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53—154页。
⑦ 惠栋《九曜斋笔记》卷二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，第20册，第635页。
⑧ 《东吴三惠诗文集·松崖文钞》卷二《沈君果堂墓志铭》，第345页。

目录、版本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、注释、名物典制、天算、金石、地理、职官、避讳、乐律诸学方面，都成果丰硕。他们对汉唐以来经学，纠谬补阙，成果显著；即他们所言义理，如戴震之说“理”，阮元之释“仁”，凌廷堪之解“礼”，皆为自家义理，论说颇新。而宋学者只是一味卫道，或者以“离经畔道”之名，大扣帽子；或者咒反对程朱者即无君父，以为威胁。理学衰微，势难扶起，而诸家说词又陈腐而毫无新意。因此，他们的攻驳就显得有气而无力。余英时在谈到当时反对戴震讲义理的学者时，曾有过一段论述。其曰：

> 大体言之，乾、嘉学人反对东原讲义理者，可以分为两派。一派是从传统的程、朱观点攻击东原的“异端”，如姚鼐（1732—1815）、彭绍升（1740—1796）以至翁方纲诸人皆是。这派人是用旧义理对抗新义理。对于来自这一方面的挑战，东原并不为所动；不但不为所动，而且他晚年还主动地要与程、朱义理划清界线。事实上，在东原生前，旧义理派虽也有一二人和他持异，但在考证派反宋学的风气下，他们的力量非常微弱，故东原也无所顾忌。①

余氏此语，深得当时之实情。双方的力量、能量与影响力不在一个层面上。再就宋学者言之，表面看起来在维护程朱理学方面，他们似有共同的主张与观点，但他们既非理学家，又非经学家，袁枚之倡“性灵”，翁方纲之标“肌理”，姚鼐之主“义法”，章学诚之主“六经皆史”，其学术主张各各不一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之间还互相诋毁，如袁枚在当时不仅对汉学家，即对其他人也多有非议，章学诚批袁枚：“彼以纤佻倾仄之才，一部优伶剧中才子佳人，俗恶见解，淫乱邪说，宕惑士女，肆辱圣言，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，败坏风俗人心，名教中之罪人，不诛为幸！彼又乌知学问、文章为何物？所言如夏畦人议中书堂事，岂值一笑！”他非常蔑视袁枚，痛斥其为“诗佛诗仙浑标榜，谁当霹雳净妖氛”②。姚门弟子，也讽刺翁方纲“于古文无所得；其治经亦似纤细处多，而下笔苦于缭绕不休；其论诗亦似有晦涩之病，有喜人同己之意”③。

因此，就乾嘉时期的学术生态而论，汉学家是一个整体，是一块厚实刚劲、无坚不摧的铁板；而宋学者虽然倾心卫道，大声疾呼，但又各有所图，少有劲道，一盘散沙而已。一方气势盛壮，论新学富；一方衰微不振，陈腐不堪。故宋学派虽厉斥疾呼，高举高打，而汉学家竟不为所动，视如无物。所以，这场争执的胜负与结局，就更不言而喻了。

以上分九个方面，就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进行了广泛而翔实的论述。笔者认为，学术史、思想史的讨论，必须建立在尊重与还原史实的基础上，必须了解与厘清当事人在当时环境下的言行及动机，进行纵横交错的探源、比较与研究，才能得出可靠而信实的结论。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对清代学术史、乾嘉考据学与桐城派等的研究起到一些参考与助益的作用。

［作者简介］漆永祥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。出版过专著《乾嘉考据学研究》等。

（责任编辑　马　昕）

① 《论戴震与章学诚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》，第108页。
② 章学诚著、仓修良编《文史通义新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209页。
③ 《太乙舟文集》卷五《寄姚先生书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489册，第593页。